

中
國
文
史

資
料
選
輯



中江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四辑

(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中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本辑编辑委员会成员：

蒋海福

陈子全

王开彬

黄宣永

彭廷忠

林永年

满良顺

谢毅英

顾问：秦韵节

范 云

李昌绪

主编：蒋海福

目 录

- “四·九”血案亲历记……………陈子全(1)
民国时期中江城关的民防和民团……………蒋海福(12)
解放初的城关派出所……………王善培(17)
解放前中江的一桩省公粮舞弊案……………胡永嬉しい(26)
德中公路……………钟标荣(33)
中江县棉花生产和经营情况简述……李钟学 梁光华(38)
喜迎甘泉越岭来——记中江农村改水工程……严 庄(54)
“四边桑”——中江蚕桑生产的创举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周庆成 赖体龙(65)
中江县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概况……夏洪发 唐道生(72)
中江文化市场的崛起……………赵学良(77)
中江县的档案管理……………蒋盛光(83)
改革开放后的中江宗教工作……………夏盛柏(90)
中江体育事业发展概述……………薛大荣(98)
中江保险事业的发展……………陈 旭(105)
中江侨务……………徐 通(110)
中江知青二、三事……………陈子全(114)
中江现存的古塔……………王启同(124)
中江通济水库……………陈 航(136)
栖妙山览胜……………夏洪发 唐道生(139)
中江诗词选辑(续)……………邓 铛 陈子全(142)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《七律》……………蒋海福(154)

“四·九”血案亲历记

陈子全

举国闻名的“四·九”血案，于1948年4月9日，发生在成都督院街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的大门内外。这次血案中，成都大专学生3000多人被困，200多人受伤，132人被捕，这是王陵基就任四川省主席几小时后一手造成的血腥暴行。这次暴行，传遍了全国，即将扮演“总统”的蒋介石惊恐不安，全国各界的抗议活动激越荡漾，连绵不断，直至蒋家王朝在四川的最后覆灭。

血案发生时，我正在川大读书，亲自目睹省府大院内外棍棒挥舞，刺刀挺杀，拳打脚踢，绳捆索绑，互相救助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景。四十八年过去了，但是，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深感这一血案之所以发生，的确是有其前因后果的。

一、历史背景

1947年10月前后，国民党中央政府通知各省选举国大代表，准备在十一月中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“制定”宪法，选举“总统”，因而激起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竞选热潮。某军军长孙德操以成都树德中学师生为骨干力量，八方游说：

西康省长刘文辉以建国中学师生为基本群众，四出拉票；有的军阀、政客，甚至还采用贿选、炮选手段，企图压倒对手，真是丑态百出，花样翻新。成都市参议员官箴予虽无财力、后台，但敢直言。他到川大礼堂发表竞选演说，痛揭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政，引起青年同学的共鸣，大家称他为“官大炮”。我和同系同学贺廷棫、孔庆麟等，听了他的演说之后，深感其人骨气可嘉，便一起到九眼桥选区给官箴予投票。竞选结果，他虽未被选为国大代表，但所得选票之多，已接近当选代表所得票数，国民党当局甚为震惊。12月初，国民党四川省特委竟以“煽动群众”、“诋毁官府”的罪名，将官箴予逮捕。消息传出，舆论哗然。中共成都市工委、民盟四川省支部，决定动员全市大中学生开展一次“保障人权，反对非法逮捕”的群众运动，以揭露国民党当局假行宪，真独裁的骗局。12月28日，川大学生自治会召开“声援官箴予暨保障人权大会”，推举杨茂德（学生自治会主席）、陈维珍、罗承云、章文伦等9人组成主席团。会后，1000多人高呼“保障人权”，“反对非法逮捕”，“立即释放官箴予”等口号，至省政府请愿，提出保障人权，反对非法逮捕，立即释放官箴予，依法惩办主谋者四项要求。省府当局未予答复。12月30日上午，四川大学、华西大学、成华大学、省立会专、协进中学等院校同学3000多人集会，再次游行到省府请愿。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从绥靖公署侧门乘车溜走，指派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、副官樊××出面，与请愿学生交涉。请愿同学将严、樊二人挟持到他们所乘小车之顶站立，要他们向大家表态，扬言“不释放官箴予，决不让他们脱逃！”樊××气得脸青面黑，火冒

三丈，但又不敢过分发作；严啸虎则嘻笑自若，毫不动气，一直与围攻同学谈笑周旋，直至下午三时，请愿同学仍不退缩。严便将衣袋内银元、钞票全部掏出，高呼：“有钱大家用，有饭大家吃！”把钱交与请愿同学代表，就近买来馒头、面包两挑，和大家分享。同学们坚持到下午5时，省府当局害怕事态扩大，被迫同意立即释放官箴予。当晚，官箴予果然获得自由，请愿取得全面胜利。因此，领导请愿的同学认为：“省府当局害怕学生，学生一斗他就要让步。”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就是当时的邓锡侯和蒋介石政权存在着兼并和反兼并的深刻矛盾，邓不愿为蒋介石卖死力，也不愿过分违反民意，而不是他害怕学生才作出上述让步的。

1948年初，全国粮食供应非常紧张，各地不断掀起“反饥饿、争温饱”运动。四川虽是“天府之国”，久有粮仓之称，但因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，滥发钞票，成都物价飞涨，大米一日数易其价。教职工领到薪金，立即奔赶安乐寺掉换银元，同学们领到公费，立即到粮店订购大米；否则，两、三天后，所领薪金、公费，便难维持下月生活。后来竟发生粮店关门，市民抢米的事件。我亲见一运物鸡公车，行经川大一宿舍左侧，突从篱笆后冲出七、八个妇女，胸拥围腰，手执剪刀，抓住车上口袋就剪，果然洒出米来，她们迅即用围腰接住，旋即冲向小道逃去。附近居民也一拥而上，转瞬便将袋内大米一抢而光，运粮车夫竟无可奈何。与此同时，被国民党军部裁撤的官兵成千上万，流落成都街头，他们闯入饭馆餐厅，佔吃霸喝，砸碗骂娘，饭馆餐厅被迫关门，行旅客商叫苦连天。饮食业主要生存，行旅客商要吃饭，饮食店便门开半扇，守卫数人，确认为善良客商，则让其进内购餐：

确认为裁减官兵，则一律婉言谢绝。在此如此严峻的形势下，3月下旬，国民党中央竟派粮食部长俞鹏飞来川督阵，要立即征粮2400万担。省长邓锡侯一再指出定额太高，百姓负担过重，压迫过度，易生事端。邓又串通省参议长向传义，副参议长唐昭明出面，请求“酌予减免，以苏民困。”俞返南京的第二天，即4月3日，邓锡侯即被召进南京述职，省主席由秘书长邓汉祥代理。这时，川大膳食团联合会主席刘光书和伙食团经理张大成等十位代表，到省府请求给川大学生配售平价米，邓汉祥在接见代表时，慨然允诺，并责成有关部门办理，但不签名盖章。在谈话中，邓有意透露，国民党中央以邓锡侯“戡乱不力，中央政令不能贯彻”而被革职，另委王陵基继任四川省主席，并对此深表不满，示意川大学生联合各校，挽邓拒王。因此，请愿代表便认为，物价飞涨，粮食供应紧张，大学生要求配售平价米，名正言顺，这一行动已蒙省府当局允诺，因而坚信目的定能达到，但却忽视了当权者的话是容易生变的，后来的事实便作了有力的证明。

1948年4月7日，王陵基由江西飞抵成都，准备接任四川省主席。我们看见各大相馆张挂他的大幅照片，身着戎装，眼戴墨镜，一副凶神恶煞的那子，人们都叫他为“王灵官”。当年，川戏班子演戏有个传统习惯：正戏之前要“跳加官”，预祝会首或东家“添官赐福”；正戏之末要“灵官扫台”，预示从此清吉平安。人们私相议论：蒋介石派王灵官来川，正象“灵官扫台”一样，他的“戏”恐怕要“么台”了，我们也快要清吉平安了。事实上，蒋介石所以选中王陵基，是因为他在江西省主席任内，完全遵照蒋介石的意

旨办事，不顾江西人民的死活。征兵则十足征齐，征粮则征足九成以上。在清查积欠和旧账中，把前任省田粮处长逼得投水自尽。他虽然弄得天怒人怨，但却深得蒋介石的赏识。他这次来川，一心想把四川搞成蒋介石最后挣扎的反共基地，因而激发了中共地下党人和四川实力派的“倒王反蒋”斗争。当时，刘文辉、潘文华已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他们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，与邓锡侯、熊克武、向传义等，组成“倒王反蒋”阵线。他们认为，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，只会出卖四川人民。要保境安民，必须倒王。要倒王，又必须以反蒋为号召，二者不可分割。办法：一是针对王陵基实施的各项措施入手，多方打乱王的部署；二是利用张群和王陵基的矛盾，表面拥张，促使张向蒋介石进言，造成蒋、张、王之间的隔阂；三是筹组川康建设促进会，倡议川人自卫，川人自治，让王陵基进入四川就象进入即将爆发的火山。因此，领导请愿的同学认为，四川的形势远非民国27年可比，我们请求配售平价米，名正言顺，况且已得代省长允诺，王陵基决不敢倒行逆施。但却忽视了王陵基凶残专横的反动本性，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四·九”血案。

二、血案真象

1948年2月下旬，民盟四川省支部负责人张志和约民盟川大区分部主任委员刘光书、组织委员谷武容，宣传委员王怒安座谈“目前形势与任务”。会上，刘光书谈到川大同学生活困难的情况，提出要求省政府给大学生配售平价米，以激发群众革命热情的想法，与当时省盟“反饥饿、争温饱”

的工作重点相符，张志和当即首肯。会后，刘光书将这意见向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长张万碌汇报，也得到张的支持。后来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得铭，约见了刘光书，并于3月29日，会同川大地下党和民盟区分部负责人，共同研究，作出了以下决定：

- 1、向省政府要求给大学生配售平价米，每人每月二双市斗（新斗），每斗按银元券120万元计算；
- 2、组织伙食团联合会，由联合会推选代表十名，向省政府请愿；
- 3、联合成都各大学，必要时举行请愿大游行。

接着，刘光书以“森林伙食团”经理身份，出面发动，地下党员和民盟成员分别在各伙食团宣传鼓动，提出要求省政府配售平价米的主张，迅即得到全校同学的拥护。

当时，四川大学没有统一的伙食团。同学们怕“吊命的公费”和家中凑足的伙食钱被总务人员中饱私囊，便以同乡会、同学会或其他团体的名义，自愿结合，各自组成伙食团。伙食标准、管理制度、结算办法，均由各伙食团自行决定。学校不予干预。只规定：凡三十人以上的伙食团，学校拨给一个厨师的工薪，其余一切自理。一段时间，全校伙食团，多达200余个。中江籍川大同学，也组成了“凯江伙食团”。我们购置彭县瓷碗（略次于江西瓷碗）作餐具，在伙食团中独具特色，搭伙者甚众。

经过宣传动员，各伙食团经理签名，成立“伙食团联合会”，简称“膳联”，并推选代表，向省政府请求配售平价米。

1948年4月3日，川大代表刘光书、张大成等向代省长

邓汉祥递交申请书，请求配售平价米，邓曾当面允诺，并约定次日和学生代表商定购米的具体办法。4月4日，刘光书、杨茂德等如期往见邓汉祥。省粮食部门负责人出面却对代表们说：“省主席已经易人，邓代主席不能越权，要王陵基主席来作主。”对华西大学和成华大学的代表也作了这样的答复。这时，各校代表深感上当受骗，因为4月3日，邓已明知省主席易人，慨然允诺，事隔一日，突然变卦！代表们回校后向“膳联”成员传达交涉经过，“膳联”成员怒不可遏，当即决定，分头联系各大学，于4月7日在川大召开各大“膳联会”负责人会，经过分析讨论，定于4月9日，组织四川大学、华西大学、成华大学、省立会专等校的同学，举行以“要求省政府配售平价米为目标”的清愿大游行。当时，我的同学谢治文在川康绥靖公署当副官，对省政府和王陵基抵蓉后的动态比较了解。4月8日上午，谢打电话给我说。“王陵基不象邓锡侯，他已调集一个警卫营进驻省政府，又买了一挑麻绳准备捆人，希望你们谨慎行事！”我立即去找刘光书，他不在，恰在二宿舍右侧碰见中江籍同学向定和（中共党员、民盟成员，经济系同学），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他，希望他转告刘光书。下午，他对我说，“成都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不怕！”

4月9日上午，川大、华大同学代表再次往见邓汉祥，邓对代表们说：“关于给你们配售平价米，邓主席（指邓锡侯）本人同意，但是他已离职，新主席下午就任，你们向他请求好了！”事已至此，不集体请愿，实难达到目的。下午，四川大学、华西大学、成华大学、省立会专等校同学约3000人，齐集川大操场，由川大出发，绕道华西坝。济川中

学同学要求出校参加游行，学校领导不准，下令校门上锁。不少同学从围墙翻出，加入了游行行列。游行队伍由老南门进城时，华阳县中等校同学又陆续加入。同学们高呼：“我们要生存！”“我们要温饱！”“我们要求配售平价米！”致使商旅驻足，市民围观，有的点头致意，有的拍手叫好。先头队伍已抵春熙南段路口，后续队伍还在西御街头。请愿同学，四人一排，秩序井然。

当时，川大校长黄季陆正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，教务长叶麟深恐学生出事，提前赶至省府，找到邓汉祥，希望邓从中斡旋，劝阻王陵基，不要对学生突下毒手。请愿队伍行抵省政府时，铁栅大门早已关闭，门内大院两旁站满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的军警。由大门至内院，两旁各架机枪数挺，如临大敌。请愿代表和守门卫兵几经交涉，始见一位军官前来答话，说：“王主席只准你们派三位代表晋见！”同学代表刘光书、张大成等随同那位军官前往王陵基办公室，当时，邓汉祥、叶麟深均在场。代表们将请愿书递交王陵基，说明了请愿理由，提出给大学生配售平价米的请求。王陵基一听，火冒三丈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王陵基今天刚上任几小时，你们就聚众要挟，我不惜再来一次‘三·三一’！”随即下令警卫将请愿代表刘光书等扣押。原来在1927年3月31日，王陵基任重庆警卫司令时，重庆市民为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，在打枪坝举行大会，参加者万余人。大会开始后，王陵基命令军警特务，向群众密集开枪，当场打死一千余人，人们称之为“三·三一”惨案。

这时聚集在省府外的几千同学，久等代表不出，估计情况有变，突闻刘光书等被扣，一时群情激愤，怒发冲冠，有

百余人奋力猛冲，突破警戒线，冲进省府大门。警卫营长气急败坏，跑去向王陵基报告：“学生冲进大门了……”王立即命令：“开枪打！”邓汉祥大叫一声“打不得！”叶麟急得放声大哭。稍停，王大声命令：“打不得就捆！”警卫营长飞奔而出，早已埋伏在省府院内和附近的军警，按照营长的眼色，一涌而出，各自手执刺刀、木棒、藤条，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，见人就打，打倒就捆。同学们奋力反抗，有的军人竟用刺刀追杀。请愿同学已挤满督院街大街小巷，被追杀捆打，推来挤去，血流满地，呼声震天，女同学游训天，大腿内侧惨中两刀，鲜血染红衣裤；男同学李维品、罗宗章等均被打成重伤；罗承方、张铁铮、杨俊（中江籍历史系同学，中共党员）等132人被捕，各大中学200余人受伤，一千余人被踩掉鞋子。我和几位同学奔入盐市街一条小巷，才幸免于难。这就是举国闻名的成都“四·九”血案。当晚，游训天、李维品、罗宗章等同学被同学们送至华西协合医院抢救，前往看望、慰问者络绎不绝，其中有学校师生，有公务人员，有医生，有市民，还有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。他们相向之际，无不潸然泪下。

4月9日夜，川大中共地下党和民盟负责人迅速组织人员，护理受伤同学，营救被捕难友。4月10日，成都各大学宣布罢课，编印《四·九快报》、《四·九血报》，印发《为“四·九”血案告全国同胞书》。各学校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宣言，声讨省政府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。王陵基恼羞成怒，变本加厉，竟指派上千军警，分驻各紧要路段进行弹压。从东门外水井街，经九眼桥至川大女生院附近，三步一岗，不准三人以上结队同行。九眼桥头两侧，军警六人架有

机枪，指向行人，如临大敌。川大校园，每到深夜，便扯“地皮风”，突然一声“来了……”便会引起大乱，以为军警来临，人人自危。我们身居学校，如坐针毡，内心压抑，令人透不过气来，那时才真正体会到黑暗岁月和白色恐怖的滋味。

反王陵基血腥暴行的风暴传遍了全国。蒋介石也惊慌失措，深恐美国主子责难，川大校长黄季陆也慌慌张张从南京国大会上，受蒋介石密令赶回成都。在川大操场，他召集全校同学，一边比划，一边劝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作为校长，就好象一只母鸡，你们就好象我的鸡崽崽，那个鸡母不爱自己的崽崽啊……”他哀求川大师生复课，向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，向各界要求停止声援活动，奔走一月之后，被捕同学才被陆续释放，杨俊同学获释回校，在烈武馆上千人的欢迎会上，同学们热烈地拥抱他，高高地举起他，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三、事件后果

“四·九”血案造成的直接后果是：

1、促进了四川地方上层人士“倒王反蒋”运动的发展。

1948年5月，刘文辉奉召进京，目睹南京政府即将崩溃，便邀集川、康两省和重庆一市的国大代表、立法委员、监察委员和省、市参议员，成立“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”，集中攻击王陵基，公开主张川人自治；并通过“三自”应变方案，即“政治自治，经济自给，军事自卫。”6月，刘文辉、邓锡侯等又成立“川康渝国大联谊会”，向王陵基公开开

炮，攻击他的征兵、征粮和大巴山设防方案。7月，又建立“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”，与蒋介石、王陵基的“戡乱”措施针锋相对，使王陵基事事掣肘，焦头烂额。1949年12月，在刘、邓、潘和所联系的大批川、康宿将起义以后，王陵基束手就擒，彻底失败。

2、加速了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的发展。

“四·九”血案惊醒了走中间路线和持超然态度的同学，大家认识到：只有团结战斗，才能求得生存，实现民主，因而纷纷投入革命阵线，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或民主同盟。从此，川大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反动势力处于孤立境地，达到了中共成都市委预期的“团结群众，壮大革命队伍”的目的。

3、扩大了革命火种的传播。

“四·九”血案以后，暴露了部分党员、盟员的身份。党、盟组织经过分析研究，决定让部分党员、盟员和进步同学离开学校，转入专、县，传播革命火种，开展统战工作，建立人民武装，打击反动势力，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。

所以，“四·九”暴露了王陵基的反动面目，也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败亡。

民国时期中江城关的民防和民团

蒋海福

解放前，由于国家不统一，司法制度不健全，对于如何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存安全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，更无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。一九一一年建立民国以后，国家虽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条文，却又缺乏相应的手段来保障法律的实施。

为了加强县城的防务和维护城关的社会秩序，中江于民国初年成立了城关区公所，当时称第一区，（后又称镇公所），作为县政府派驻镇上的工作机构，其主要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- 一、催收辖区内的公粮、田赋，督促上缴政府。
- 二、维护区（镇）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秩序。
- 三、按政府规定，向各保摊派壮丁款或壮丁人数。
- 四、代表政府调查灾祸情况，组织社会救济，为房产田产交易税契作中。
- 五、调解民事纠纷，赈孤恤寡。
- 六、协助政府缉匪、缉盗，禁止烟毒等。

当时区（镇）公所设镇长一人，副镇长一人。所内设民政、户籍、文书、财务干事各一人，所有上列人员按月向县

财务委员会领取薪饷，薪饷一般是以黄谷支付。

关于民防军事组织，经详细考证资料，城关镇在光绪元年以前（公元一八七五年），无任何政府的正规武装力量或军事组织。

据一九三零年版《中江县志》卷十三载：清朝咸丰、同治年间，“政府编保甲以清盗匪，防奸民”。在中江首办团练，县令王应昌还负责五县团防事宜。后因财政拮据，成为有名无实，但团练的组织领导和指挥权力仍属于县令。

一九一二年，县内盗匪猖獗，蹂躏乡民，而当时政府兵已腐败不堪用，于是，县令乃选各乡乡勇五百人，精选后，剩三百一十人作团防兵勇，设团防局管理，其经费系挪用县立高小教育经费五千串支付。后来，县府又将团防局经费摊派到公粮上，每斗加银四钱，作为训练团练及购置枪械用。仅此一项，每年可多收白银七千两，以后竟成为各场镇自办团练经费来源的根据。

一九一五年，省政府正式颁行团练章程，规定各乡设团总，团总下设团正，管理各团事务。团总由县府任命，团丁则按户出丁，每户出一人。每月逢十，由团总组织区内团丁统一训练，讲授简单的军事常识，如编队，操练等。每年五月，全县各团选派团丁到县上参加会操，以检阅平时操练的情况，这是一种民兵性质的准军事组织。

城关当时共分五个团，分别叫东团、西团、南团、北团、新团，各团组成一队，共分五队，每日调操一队，每五日轮换一次，每半月会操一次。从这时起，城关才开始建立民团。据民国《中江县志》载：一八八一年，中江城关共有户口四千零六十二户，人口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人，如果按每